

近代中朝海上貿易与華商(1876-1900) : 以仁川港为中心

孫, 科志
復旦大学

<https://doi.org/10.15017/2198481>

出版情報 : 韓国研究センター年報. 5, pp.39-47, 2005-03-15. Research Center for Korean Studies, Kyushu University

バージョン :

権利関係 :

近代中朝海上贸易与华商 (1876-1900)

— 以仁川港为中心 —

孫科志 (復旦大學)

中韩之间有着数千年的交往历史，这种交往既包括人员的来往，也包括物质的交流。在很长时期内，这种物质交流主要是通过朝贡贸易实现的，只是在两国的边境地区存在一些小规模的边贸。虽然中韩隔海相望，近在咫尺，两国之间的贸易条件非常便利，但除了宋朝与高丽的海上贸易较频繁之外，在近代以前，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所占的地位可以说微乎其微。只有到了近代，随着韩国的开港，中韩之间的民间贸易开始活跃起来，特别通过海上的自由贸易。虽然这个时期两国的朝贡贸易还继续维系着，但海上贸易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却显不足，专门著作和专题论文并不多见，只是在中朝关系史等一些著述中略微提及。⁽¹⁾中朝的海上贸易关系是进入近代后两国间发展的一种新型关系，在数千年的两国交往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来中朝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近代的中朝海上贸易中，仁川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仁川港是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之一，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成长为近代朝鲜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另一方面近代中朝海上贸易主要是通过仁川港进行的，这无论是从仁川港的中朝贸易额还是从在仁川从事中朝贸易的华商人数的来看，都可以得出这一结论。通过仁川港的中朝海上贸易几乎全是由华商承担，不仅如此，华商还把货物从日本输入到仁川，把经营领域扩大到了日朝贸易之中，尽管所占的份额并不是很大。有鉴于此，笔者拟就以仁川为中心的近代中朝间海上贸易和此贸易的主要承担者即华商做初步研究，以抛砖引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研究的范围设定为朝鲜开港之后至1900年。

(1) 如杨昭全等的《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林子候的《甲午战争前之中朝关系》(台北，玉山书局，1990)，林明德的《袁世凯与朝鲜》(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4)等著作中曾涉及近代中朝贸易关系，但因篇幅太少，许多问题没有展开论述。

一 近代中朝海上贸易之肇始

在近代以前的各朝代中，以宋朝时期中朝海上贸易最为发达，据《高丽史》记载，自高丽显宗3年(宋真宗大中祥符5年，公元1012年)至忠烈王4年(宋帝昺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的266年中，宋商往高丽130次，4,949人。⁽²⁾由于宋朝时期宋与高丽陆上通道基本上被切断，所以这些商人均是由海路进入高丽中部。宋以后，中朝之间的民间贸易虽仍较活跃，但主要限于在两国接壤的地区进行互市。

清朝入关后，为了收复台湾，一度实行海禁，禁止国人渡海出洋。收复台湾后虽曾解除了海禁，但从18世纪初开始，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东来，清政府再度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多次颁布《南洋渡海禁令》，禁止国人渡海出洋，也禁止国人与洋人交易。这个时期的朝鲜“久列藩封，典礼所关，一切均有定制，惟商民货物，不准在各处私相交易”。⁽³⁾尽管朝鲜与清朝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允许国人与中国人进行贸易等往来，但是这种贸易往来主要限于陆路贸易。在朝鲜开港之前，中朝间的民间贸易主要有两种形式，即使节贸易和边境贸易。前者是朝鲜每年派往清朝的冬至使及随行人员携带一些货物，与中国民间人士进行贸易，这种贸易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后者是指在两国的接境地区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允许两国人民进行贸易。当时中朝之间的边境贸易主要有义州和会宁两个地方，每年的3月20日至5月30日，9月10日至10月30日和11月20日至12月30日，两国人民可以在指定的地方互市。⁽⁴⁾但是在朝鲜开港之前，中朝之间的海上贸易是被禁止的，甚至在朝鲜开港后的相当

(2) 转引自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第268页。

(3)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1972，第680页。

(4) [日] 盐川铁一郎：《朝鲜通商事情》，东京 八尾书店，1895，第13至14页。

一段时间内也禁止两国人民私相贸易。所以在壬午兵变之前，朝鲜半岛上很少有华商的踪影。⁽⁵⁾

1876年日本借口云扬号事件迫使当时的朝鲜政府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打开了朝鲜的大门。从此之后日本商人大批涌入朝鲜，从事日朝贸易，使得日朝贸易迅速发展起来，日本政府也趁机在朝鲜扩展势力。

日本在朝商业势力的迅速扩展，使朝鲜政府上下颇感不安，力图寻找一种牵制力量，而华商则是牵制日本商人的最佳选择，所以1881年1月朝鲜政府遣使，希望清政府允准中国商人前往朝鲜各通商口岸贸易：“小邦今与日本开港通商，然小邦素昧商规，恐被欺压，上下胥愿倘邀上国商人来会开港诸处，互相交易，情志既孚，依赖必大”。⁽⁶⁾1882年4月朝鲜使节鱼允中等再次向清政府表示：“上国及本邦人民於已开口岸，互相交易，以分外人独占之利”。⁽⁷⁾而这时清政府中的一些官吏也主张应鼓励华商前往朝鲜贸易，当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给清帝的奏折中就说：“中国与朝鲜密迩，华货之可销于朝鲜者不少，该国参，布，皮，纸亦为华人日用所需。不开海禁，则有无不相通，徒使洋船获利”，⁽⁸⁾时任驻日公使馆参赞的黄遵宪在其所著的《朝鲜策略》中也主张：“令华商乘船来开港各口通商，以防日人垄断”。⁽⁹⁾对于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一些中国官员的主张，清政府表示：“朝鲜向无海运贸易之例，现既与外国通商，则华商前往贸易亦所不禁。至于黄参赞策略防日人垄断之语，果能与各国通商，日人自无从垄断。将来如愿华商前往贸易，应由国王将实在情形咨请核奏办理”。⁽¹⁰⁾此后清廷开始与朝鲜进行签订商约的交涉，而1882年7月发生的壬午兵变则加速了中朝通商条约的签订。1882年8月，清与朝鲜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以下简称《章程》)。根据《章程》，中国商民获准在朝鲜已开口岸设栈贸易，而且还可在“朝鲜杨花津，汉城开设行栈”。⁽¹¹⁾这样《章程》的签订解除了两国之间的海禁，为中朝海

上贸易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根据1876年日本与朝鲜签订的《朝日修好条规》(又名《江华条约》一笔者)及其附则，朝鲜向日本开放仁川，釜山和元山为通商口岸。从地理位置上看，元山位于朝鲜半岛的西海岸，与中国中北部各港口相距较远；釜山虽然距中国各港口相对较近，但因日本商人在此经营多年，这里已成日本商人的势力范围。所以在三个通商口岸中，就中朝贸易来讲，仁川是最佳的贸易港口。在仁川至汉城的京仁铁路开通之前，可以通过水路进入汉城。京仁铁路开通后，与纵贯朝鲜半岛的京义(汉城至义州)，京釜(汉城至釜山)铁路相接，陆路交通也非常发达。正是由于具有发达的海上交通和陆路交通，仁川成为近代朝鲜半岛最重要的贸易港口。

《章程》签订后，华商开始正式进入朝鲜从事贸易活动，主要由华商担纲的中朝海上贸易逐渐活跃起来。因为条约是8月份正式签订的，所以这一年即使有华商到朝鲜贸易，估计人数也不会太多，贸易额也非常有限。1883年可以说是中朝海上贸易的第一年，在这一年中，前往朝鲜从事贸易的华商开始增多，至年底仁川的华商店铺有7家，船户1家，从业商人有52人。⁽¹²⁾但贸易额似乎并不大，因为从该年5月至12月，华商向仁川海关缴纳的进口税只有英洋3,828.61元，出口税也不过英洋117.78元。⁽¹³⁾进入1884年，情况稍微有所改观。这一年进出仁川港的华商帆船共计36艘，共装载货物13,640担，单艘帆船的最大载货量为980担。从这些船只的出发港口来看，由烟台出发的最多，有18艘，其后依次为俚岛，威海等。⁽¹⁴⁾该年常驻仁川和经常往来于仁川的华商235名，从其籍贯来看，虽然有的来自江浙，广东等地，但绝大部分是来自山东。⁽¹⁵⁾就贸易额来看，虽然比前一年有所增加，但仍然很低，该年华商共向仁川海关缴纳进口税英洋8,509.93元，出口税为英洋526.67元。⁽¹⁶⁾

自《章程》签订至1884年可以说是近代中朝海上贸易

(5)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4，第187页。

(6)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1972，第484页。

(7)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597页。

(8)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004页。

(9) 同上。

(10)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85页。

(11)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992页。

(12)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338至1339页。

(13)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340至1341页。

(14)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770至1775页。

(15)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793至1796页。

(16)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811至1812页。

的初创期，所以这一时期的中朝海上有着贸易规模小，形式单一，商品种类少等特点。虽然没有这两年仁川港的中朝贸易额统计数字，但是从上面所列举的华商所缴纳的进口关税中可以看出。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清朝入关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海禁政策，虽然中朝隔海相望，但是两国间的海上贸易是被禁止的。《章程》签订之后，华商得以进入朝鲜经营，但是这时进入朝鲜的华商多是抱着试探的心理，对朝鲜的市场并不是很了解。至于贸易形式，这个时期华商主要从事中国对朝鲜的出口业务，从朝鲜进口的货物非常少。在具体的经营方式上，虽也有一部分华商在仁川等地开设商栈，但大多数属跑单帮类型，且以距朝鲜较近的山东商人为主。就商品的种类来看，中国向朝鲜出口的货物“以洋布，火油，杂货为大宗，销售最繁，商人籍此颇获利益”，⁽¹⁷⁾而自朝鲜进口的货物主要是一些土特产品，如人参，牛皮和金沙，海参等。

从1885年开始，仁川港的中朝贸易开始了稳定的增长，在1889年之前，其贸易额虽然还不能与日朝贸易相比，但是就增加的速度来看，却是超过了日朝贸易。1885年至1889年仁川港的中朝贸易和日朝贸易的进口额如下表：⁽¹⁸⁾

仁川港中朝，日朝贸易额比较 (1885~1889) (单位：洋元)

年度	自中国进口	比上年增长 (%)	自日本进口	比上年增长 (%)
1885	242,680	—	726,760	—
1886	406,856	67.7	941,550	29.6
1887	641,340	57.6	827,113	-12.2
1888	636,092	-0.8	1,049,486	26.9
1889	729,037	14.6	1,113,647	6.1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仁川港中国向朝鲜的出口额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日本向朝鲜出口额的增长速度。从1885年至1889年，虽然1888年于1887年相比为负增长，但也只有-0.8%，而这一时期中国向朝鲜的出口额的平均增长速度却高达34.8%，其中1886年增长得最快，比上一年增加了67.7%。而同一时期仁川港日本向朝鲜的

输出额的平均增长率却只有12.6%，最高的也不足30%。这一时期仁川港的中朝贸易之所以能保持稳步的增长，得益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以下几个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这一时期正是清政府开始着手加强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而加强中朝之间的商务联系也被作为强化宗藩关系的一环。

1884年12月4日，朝鲜的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以甲申政变为契机，清政府更多地介入朝鲜的内政和外交。1885年11月，作为这种政策的执行者袁世凯被授予“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职衔，派驻朝鲜。派袁世凯驻朝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干预朝鲜的内政和外交，加强清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这在李鸿章给朝鲜国王的推荐信中表露无遗。李鸿章称：“袁守忠亮明敏，心地诚笃。……奉旨令驻扎汉城，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¹⁹⁾袁世凯至朝鲜后，根据李鸿章的意图积极干预朝鲜的内政和外交，加强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同时还把拓展中国商务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在汉城与仁川等地增建华商会馆，扩充租界，并尽力招徕华商，保护华商利益。⁽²⁰⁾1886年和1889年，朝鲜发生了大面积的农业歉收，为了解救饥民，朝鲜政府通过袁世凯向清政府提出准许商民向朝鲜输送米粮的请求，袁世凯则为华商输送米粮到朝鲜争取到了免去关税的优惠。⁽²¹⁾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清政府加强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确实为中朝贸易的发展和华商在朝鲜的经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其次，在经营对朝鲜的出口贸易中，华商占据着非常有利的条件。在近代的的中朝贸易中，特别是向朝鲜的出口贸易中，几乎全是由华商承担的，虽然也有朝鲜商人涉足中朝贸易，其在中朝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却微乎其微。从华商向朝鲜出口的商品上看，各种纺织品占了绝大部分。这些纺织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中国国内生产的纺织品，如各种绸缎，棉布，麻布等，一是英美等的机制纺织品。无论是中国生产的纺织品还是英美等的机制

(19) 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128页

(20) 前引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191页。

(21) 韩国高丽大学小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编：《旧韩国外交文书》8（清案1），高丽大学校出版部，1970，第297页。

(17)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117页。

(18) 前引盐川铁一郎：《朝鲜通商事情》，第56至57页。

纺织品，其集散地都在上海，价格非常低廉。而经营中朝间纺织品贸易的华商“多在上海设立有本店或与上海的商店脉络相通”，⁽²²⁾因此可以以比较低的价格从上海直接购入这些产品，运往朝鲜销售。日本虽然在明治维新之后积极对外开放，也积极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但是日本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能够成为可以与上海相比的外国商品的集散地，所以很多日商也不得不从长崎从上海购入西洋的商品，然后再输入到朝鲜贩卖，这样无疑增加了经营成本，减少了利润空间，在与华商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第三，中朝之间的海上交通非常便利，这也成为华商经营中朝贸易的一个有利条件。1883年11月，朝鲜统理各国事务衙门与上海的轮船招商局签订了关于轮船来往上海和仁川之间的协约。根据这一协约，招商局选派的“富有”号轮船于11月13日从上海出发，经由烟台于18日抵达仁川，⁽²³⁾这样近代中韩之间第一条定期航路宣告开通。它的开通，为中朝之间的贸易往来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1884年1月，清总办朝鲜商务陈树棠与朝鲜督办交涉通商事宜闵泳穆又签订了关于招商局轮船往来上海与朝鲜的后续条约，其中规定“招商局专派轮船一只，常川往来上海朝鲜，或绕走烟台，仁川，釜山，长崎，上海，或绕走长崎，釜山，元山，烟台，上海，惟视有多货客水脚之埠绕走，周而复始，一年为期，不论次数”。⁽²⁴⁾这样就使得中朝贸易的交通条件更加便利。除了利用开通的定期航路，华商在很多情况下使用较原始的蓬船运送货物，这样一方面更为便利，另一方面也降低了货物的运输成本。有时华商及其货物也搭乘往返于中国与朝鲜的清军兵船。⁽²⁵⁾

第四，中朝之间悠久的交往史和相近的文化，生活习俗等也为中朝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朝之间有着数千年交往的历史，在这数千年交往的过程中，两国的文化和生活习俗互相影响，使得两国的文化和生活习俗非常接近。而两国之间的物质交流使得两国人民非

常熟悉对方的商品。就拿中国产的绸缎来说，长期以来是朝鲜社会上层人士的衣料，需求量很大。而朝鲜的红参在中国则广为人知。在近代两国海上贸易之前，前往中国的朝鲜使节多携带朝鲜的红参，在中国出售，然后再购入中国产的绸缎等，带回国内。⁽²⁶⁾两国的这种文化和物质交流为中朝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华商的辛勤经营也是中朝贸易稳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章程》签订之后，华商开始来到朝鲜进行经营活动。他们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辛勤的经营，推动着中朝贸易的发展。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予以阐述。

二 中朝海上贸易在曲折中求发展

仁川开港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独占仁川港的对外贸易，直到19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朝英修好通商条约，朝德修好通商条约和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签订，仁川港的对外贸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独占仁川港对外贸易的局面被打破，形成了日朝贸易，中朝贸易和洋朝贸易三分天下的局面。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又发生变化，先是在仁川经营纺织品贸易的德商世昌洋行从1882年开始转而经营向朝鲜政府贷款的业务，在仁川经营纺织品进口和牛皮等出口的美商塔文森特商社从1883年开始转而经营精米业，此后在仁川港的英国和德国商人所开的商店也先后关门。⁽²⁷⁾这样仁川港的对外贸易又变成了日朝贸易和中朝贸易两分天下的局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仁川港的日朝贸易和中朝贸易也开始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日商自朝鲜开港之后就来到仁川，经营日朝贸易，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了仁川港的对外贸易，而华商自1883年之后才开始进入仁川经营中朝贸易，日朝贸易额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远远超过了中朝贸易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仁川港的对外贸易天平开始向中朝贸易倾斜。1890年对仁川港的中朝贸易来说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华商输入到朝鲜的货物总额第一次超过了日商，此后这种势头一直保持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893年。这可以说是1890年至1900年仁川

(22) 《朝鲜国输入金中ノ商况ニ付当業者ノ注意ヲ喚起ス》，《通商汇纂·韩国篇》2，汉城 疆江出版社影印，1987，第13页。

(23) 前引《旧韩国外交文书》8（清案1），第18页。

(24) 前引《旧韩国外交文书》8（清案1），第19页。

(25) 前引《旧韩国外交文书》8（清案1），第287页。

(26) 前引盐川铁一郎：《朝鲜通商事情》，第15页。

(27) 《明治二十六年中仁川港商况年报》，《通商汇纂·韩国篇》1，汉城 疆江出版社影印，1987，第495页。

港中朝贸易的第一个时期，1894年至1896年则为第二时期，1897年至1900年为第三时期。

1890年至1893年是仁川港中朝贸易的发展期。从1890年开始，仁川港中国对朝鲜的输出总额第一次超过日本对朝鲜的输出总额，此后到1893年，虽然中国对朝鲜的输出总额增减不一，但是一直高于日本对朝鲜的输出总额。这个时期中国对朝鲜输出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担纲中朝贸易的华商从1883年才开始进入朝鲜，对朝鲜市场不是十分了解，因此在拓展市场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这一时期有很多货物都是日商首先输入，然后华商才输入，这样在商机上就输给了日商一着。

1894年至1896年是仁川港中朝贸易的停滞期。由下表可以看出，1894年至1896年的中朝贸易相对来说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太大的变动。这主要是由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造成的。甲午中日战争对于中朝贸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华商多年在朝鲜的经营毁于一旦。其实在1894年的前6个月中，中国对朝鲜的贸易额还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共输往朝鲜价值827,183元的货物，⁽²⁸⁾这还不包括华商在这期间输往朝鲜的价值156,721.50元的大米。⁽²⁹⁾但是随着清军和日军进入汉城，中日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为了躲避即将到来的战争，华商纷纷低价处理所有的存货，也有华商把存货委托给其他国家的商人，⁽³⁰⁾然后回国。至8月份，仁川的华商基本上全部归国，轮船招商局经营的上海至仁川航线也停驶，这样由华商经营的中朝贸易基本上已断绝。这从华商归国后仁川港输入品的价格暴涨也可以看出。⁽³¹⁾华商归国之后，日本商人乘机抢占了华商的经营领域，夺取了原来由华商控制的纺织品贸易权，当时日本驻仁川领事馆在报告仁川商业情况时也不无得意地说“数年来由清商霸占的金巾输入和占领的其它一切商路的朝鲜贸易开始归于本邦商（人）的掌握之中，这实在是东洋商

业史上的一大关节”。⁽³²⁾华商在仁川经营数年所获得商权丧失殆尽。战争结束之后，华商陆续返回了仁川港，但是返回后他们不得不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店铺的修缮上。而且就战后的中朝贸易条件来看，与战前相比，对华商非常不利。就拿交通条件来说，在1894年招商局的汽船一直担当着从仁川经芝罘到上海的航线，这条航线运输周期短，运价低，为华商经营的中朝贸易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战争结束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交通原因，华商在经营对朝鲜的输出贸易中不得不转由长崎。⁽³³⁾后来虽然有两条航线可资利用，一条是由俄国的船只担当的仁川经上海至浦潮的航线，一条是由日本邮船会社担当的香港经上海，芝罘，仁川，长崎，釜山，元山到浦潮港的航线，但是这两条航线往返一次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像后一条航线往返一次就需要36天的时间，⁽³⁴⁾这对华商经营的中朝贸易非常不利。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个时期中朝贸易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1897年至1900年是仁川港中朝贸易的恢复期。经过前一时期的停滞之后，华商克服种种困难，逐渐恢复了失去的商权，重新掌握了纺织品的输入权。在1898年，华商输入的机制纺织品就达313,813反，同年度日本商人输入的该类产品只有86,577反。⁽³⁵⁾不仅如此，中朝贸易的领域也进一步拓宽，输往朝鲜货物的种类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增加。但是从下表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中朝贸易并不稳定，波动比较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朝鲜动荡的局势造成的。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并没有能够完全控制朝鲜，不仅如此，俄罗斯势力也开始积极介入朝鲜事务，从此开始日俄对朝鲜的争夺。就朝鲜内部来看，随着日、俄等对朝鲜侵略步伐的加快，民众反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而政府内部亲俄、亲日势力的对立也造成了政局的不稳。所有这些造成这一是朝鲜局势的动荡，对于中朝贸易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28) 次数据系1894年1月至7月仁川商况中的数字合计而成，参见《通商汇纂·韩国篇》1，第246至476页。

(29) 《仁川港ニ於テ支那米ノ輸入境況》，《通商汇纂·韩国篇》2，第405页。

(30) 《本年（明治二十七年）九月仁川港商况》，《通商汇纂·韩国篇》2，第31页。

(31) 《仁川港ニ於テ七月以後物價暴騰ノ景況》，《通商汇纂·韩国篇》1，第650页。

(32) 《仁川港十月商况》，《通商汇纂·韩国篇》2，第77页。

(33) 《二十七年十一月中仁川港商况》，《通商汇纂·韩国篇》2，第153页。

(34) 《本年（二十八年）五月仁川港商况》，《通商汇纂·韩国篇》2，第626页。

(35) 《仁川三十一年中贸易年报（续）》，《通商汇纂·韩国篇》7，第629页。

这一时期中朝贸易和日朝贸易的具体情况如下表：⁽³⁶⁾

中朝、日朝贸易的消长（1890~1900）（单位：洋元）

国别 年度	中 国			日 本		
	出口	进口	合计	出口	进口	合计
1890	1,312,614	52,932	1,365,545	1,259,218	1,371,015	2,630,233
1891	1,738,044	103,029	1,841,073	1,426,463	1,310,345	2,736,808
1892	1,712,272	101,299	1,813,571	1,318,707	943,710	2,262,417
1893	1,589,126	79,365	1,668,491	845,349	577,637	1,422,986
1894	1,759,619	95,203	1,894,822	1,942,603	1,145,407	3,088,010
1895	1,688,641	51,828	1,740,469	3,011,131	1,416,620	4,427,751
1896	1,920,687	257,277	2,177,964	1,784,756	1,545,994	3,330,750
1897	3,121,055	230,919	3,351,974	2,742,005	2,876,043	5,618,048
1898	4,363,334	1,064,748	5,428,082	3,333,004	1,222,961	4,555,965
1899	2,867,630	506,096	3,373,726	3,376,753	1,090,880	4,467,633
1900	1,997,973	1,780,324	3,778,297	4,790,203	2,433,741	7,223,944

综观这一时期仁川港的中朝贸易，可以说有以下特点：

首先，仁川港的中朝贸易以向朝鲜输出的贸易为主，自朝鲜输入的贸易为辅。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除了1898年和1900年之外，中国自仁川进口的货物都很少，与向朝鲜出口的货物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1898年出口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朝鲜向中国出口红参的增加。红参在朝鲜一直都是禁止出口的物品，一般是每年冬至时，朝鲜政府派往北京的冬至使一行随员及特许商人携带红参到北京，在指定的地方销售。但是1895年甲午改革之后，为了促进人参种植的发展，朝鲜政府规定商人在交纳一定的税金后可以自由出口红参。这样就导致朝鲜向中国出口的红参数量急剧增加。在1898年向中国的输出额中，红参一项就达939,610元，占全部输出额的88.2%。⁽³⁷⁾1900年的情况也是如此。1900年输往中国的红参总额为1,505,200元，红参须为42,200元，两项合计1,547,400元。

(36) 1890至1894年的统计数字来源于《二十七年中仁川港商况年报》（《通商汇纂·韩国篇》2，第266至267页，1895年的数字来自于《二十八年中仁川港商况》（《通商汇纂·韩国篇》4，第298页），1896年的数字来自于《二十九年中仁川港商况年报》（《通商汇纂·韩国篇》5，第600至601页），1897年的数字来自于《三十年中仁川港商况年报》（《通商汇纂·韩国篇》6，第384页），1898年至1900年的数字来自于《仁川三十三年贸易年报》（《通商汇纂·韩国篇》9，第189至190页）。

(37) 《仁川三十一年中贸易年报(续)》，《通商汇纂·韩国篇》7，第672页。

占当年的输出总额的86.9%。⁽³⁸⁾如果把输往中国的红参不计算在内的话，每年实际输往中国的货物总值一般在100,000元以下。而从1890年到1900年，中国通过仁川港向朝鲜的出口额都超过100万元，最高的1898年竟达400多万元。由此可见，在近代仁川港的中朝贸易中，向朝鲜输出的贸易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除红参之外，自朝鲜输入的贸易只占很小的部分，即使在这很少一部分的输入物品中，有不少是朝鲜商人向华商购买货物时的代偿物。⁽³⁹⁾日朝贸易则与之相反，从朝鲜的输出额在整个日朝贸易额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其次，中朝贸易的商品种类也越来越多。近代中朝贸易开始的时候，进行贸易的商品种类非常少，就是一直在中朝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纺织品，在最初品种也是非常少。在80年代，华商输往朝鲜的纺织品主要有白洋布，花洋布，红哔叽，绿哔叽等。⁽⁴⁰⁾但进入90年代，华商输往朝鲜的纺织品种类非常多。就机制纺织品来看，就有棉布类，绒毛布，杂样布等3大类20多个品种。⁽⁴¹⁾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杂货。以1900年为例，中朝贸易的商品种类就达129种之多。⁽⁴²⁾

第三，仁川港的中朝贸易以纺织品的贸易为主。与19世纪80年代相比，虽然中朝贸易的商品越来越多，但是纺织品的贸易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从1897年到1900年输往朝鲜的纺织品数额与输出总额的比较中就可以窥见一斑。⁽⁴³⁾

由上表可以看出，自1896至1900年，在仁川港的中朝

纺织品输出额与总输出额的比较（1896~1900）（单位：洋元）

年度	纺织品输入额	总输入额	纺织品所占比重(%)
1896	1,544,817	1,920,687	80.4
1897	2,491,945	3,121,055	79.8
1898	2,779,422	4,363,334	63.7
1899	2,283,975	2,867,630	79.6
1900	1,533,450	1,997,973	76.8

(38) 《仁川三十三年贸易年报》，《通商汇纂·韩国篇》9，第203页。

(39) 《二十七年中仁川港商务年报》，《通商汇纂·韩国篇》2，第289页。

(40) 前引《旧韩国外交文书》8（清案1），第123页。

(41) 《光绪十八年朝鲜三关贸易册》，出版者不详，1892，第6至7页。

(42) 《仁川三十三年贸易年报》，《通商汇纂·韩国篇》9，第191至202页。

(43) 此统计数字来源于1897年至1900年仁川港贸易商况，参见《通商汇纂·韩国篇》6-9。

贸易中，中国输往朝鲜的纺织品占了输出总额的60%以上。最多的1896年，中国输往朝鲜的纺织品在输出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80%。由此可见，在近代中朝贸易中，纺织品的贸易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三 仁川港的华商

由于仁川港与中国的山东隔海相望，“朝鲜距登旅烟威，一航可通”，所以早在开港之前，就有国人利用戎克船和小型汽船进入仁川，进行物资交易。⁽⁴⁴⁾《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签订之后，华商开始进入朝鲜展开经营活动。仁川也就开始有了常住的华商，也出现了华商开设的店铺。到1883年底，仁川共有华商店铺7家，船户1家，从业商人52人。⁽⁴⁵⁾1884年，常驻仁川和经常往来于仁川的华商与上一年相比增加到了235人。⁽⁴⁶⁾随着仁川港商业和对外贸易特别是中朝贸易的发展，仁川港的华商人口也逐渐增多。除了华商之外，一些匠人，农民也来到仁川，使得仁川港的华侨人口基本上保持着增长的势头。根据目前可以找到的资料，将各年度仁川港华侨人口的变动列表如下：⁽⁴⁷⁾

各年度仁川港华侨人口变动 (单位：名)

年度	华侨人口	资料来源
1886	205	各该年度咨送朝鲜各口华商清册，见《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209、2978、3136和3276页。
1891	563	
1892	637	
1893	711	
1895	482	《二十八年中仁川港商况年报》，《通商汇纂·韩国篇》4，第359页。
1896	745	《二十九年仁川港商况年报》，《通商汇纂·韩国篇》5，第643页。
1897	1,331	《明治三十年中仁川港商况年报》，《通商汇纂·韩国篇》6，第459页。
1898	1,327	《仁川三十一年贸易年报》，《通商汇纂·韩国篇》7，第699页。
1899	1,775	《仁川三十二年贸易年报(完)》，《通商汇纂·韩国篇》8，第262页。
1900	1,831	《仁川三十三年贸易年报》，《通商汇纂·韩国篇》9，第218页。

《仁川港对支那贸易(一)》，朝鲜总督府调查课：《调查汇报》第3号，1924年2月。

由上表不难看出，除了1894年至1895年，仁川港的华侨人数剧减之外，其他年度都比上一年度有所增加。

1894年至1895年仁川港华侨人数剧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甲午中日战争。早在1894年7月即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仁川港的华商就开始处理积存的货物，治装归国。1895年战争结束之后，虽然华侨陆续返回仁川，但是由于士兵未完全稳定，加上这时中朝之间的交通并不便利，回到仁川的华侨人数并不是很多。到1896年，随着局势趋于稳定，仁川港的华侨人数也恢复了增加的势头。

日本的相关机构在统计仁川的华侨人数时，把仁川的华侨全部算作商人，事实并非如此。在仁川的华侨中，既包括工匠如石工，瓦工，也包括经营蔬菜种植业的农民等，⁽⁴⁸⁾当然最多还是商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从华商的籍贯来看，虽然有的来自江浙，广东等地，但绝大部分是来自山东。⁽⁴⁹⁾虽然从1884年开始，在仁川设了中国的中国租界，但是租界属于丘陵地区，车马的通行极为不便，是仁川的日本租界，中国租界和各国租界等三个租界中交通最为不便的地方。加上租界距海关码头较远，不属于繁华的商业区域。因此华商中的巨商并不住在租界内，住在该租界的主要是那些杂货零售商和从事杂业的华侨。⁽⁵⁰⁾

仁川的华商最主要的经营就是中朝贸易，在中朝贸易中有特别注重自中国向朝鲜的输出，可以说仁川港的中朝贸易绝大部分是有华商经营的。虽然朝鲜开港之后，也有一些朝鲜商人渡海前往中国贸易，但是这些商人多是携带一些人参前往中国各地销售。也有一些朝鲜商人从上海等地输入一些西洋物品，在朝鲜各地销售，朝鲜商人李炳龙就常从上海输入一些钟表，到朝鲜销售。⁽⁵¹⁾但是这些朝鲜商人所经营的中朝贸易在整个中朝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到了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朝鲜

(44)《仁川港对支那贸易(一)》，朝鲜总督府调查课：《调查汇报》第3号，1924年2月。

(45)《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338至1339页。

(46)《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802页。

(47)另据《仁川港对支那贸易(一)》(朝鲜总督府调查课：《调查汇报》第3号，1924年2月)，1895年仁川港的华侨人数为700人。

(48)《在韩清国人贸易上之势力》，《通商汇纂·韩国篇》8，第263页；《明治二十六年中仁川港商况年报》，《通商汇纂·韩国篇》1，第625页。

(49)《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793至1796页。

(50)《明治二十六年中仁川港商况年报》，《通商汇纂·韩国篇》1，第497页。

(51)《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519页。

商人经营向中国输出红参，其经营额才有所增长。但在向朝鲜输出的贸易中，华商占有着绝对的优势。

经营向朝鲜进行输出贸易的仁川华商主要是那些有着雄厚资本的大商号。这些大的商号多由五、六人或十五、六合股组成，像广东商行同顺泰，山东商行瑞盛泰，双盛泰，永来盛都是具有二、三百万巨资的大商行。⁽⁵²⁾ 这些大的商号主要经营中朝贸易，特别是从中国直接输入各种纺织品和杂货等，玉蜀黍和粟等粮食。⁽⁵³⁾ 也根据输入的货物批发给韩国商人或者华商中的零售商，再由他们把这些货物输入送到其它各地，有时也有日本商人从华商那里批发输入的货物。⁽⁵⁴⁾ 也有一些大商号直接派人到内地设立商铺，直接销售输入的商品。1896年11月，仁川的某华商就派员到平壤开设商店，该员到平壤之后，租住在韩人的房子里，另在他处开设店铺，销售输入的纺织品和石油等杂货，同时也收购米谷，金子等。此商店在当时的平壤算是很大的，⁽⁵⁵⁾ 由此看来，设在仁川的总店其规模更大，应属于那种豪商之列。

就这些华商大商号输往朝鲜的商品来看，虽然种类越来越多，但就输出额来看，各种纺织品和大米，玉蜀黍、粟等粮食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华商输往朝鲜的纺织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英美等的机制纺织品，也就是洋布，另一类则是中国本土产的纺织品，包括各种绸缎，棉布和麻布。洋布和棉布主要是朝鲜下层人民的衣料，各种绸缎则是朝鲜上层社会使用的衣料，麻布又称夏布，有两种用处，一是朝鲜人缝制夏季衣服的主要布料，一种用途是朝鲜人居丧时期的必需衣料，所以这些纺织品在朝鲜的需求量都比较大。华商的输往朝鲜的洋布，绸缎和棉布主要来自于上海和江浙一带，而麻布则主要是来自于广东。⁽⁵⁶⁾

大米，玉蜀黍和粟等粮食虽然是华商输往朝鲜的重要物品，在近代中朝海上贸易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

华商多是在朝鲜因农业歉收而发生饥馑的时候才向朝鲜输出的，而且最初的几次是由于两国政府的介入才促成的。中国大米输往朝鲜，始于1884年。当时由于朝鲜农业歉收，朝鲜政府通过清政府派驻朝鲜商务总办陈树棠向清政府请求暂时解除“米粮出口之禁”，允许商民运米前往朝鲜销售，朝鲜政府则给予免税的优惠。此后华商在朝鲜农业歉收，米价上涨的时候，向朝鲜输往大量的大米，其中以1894年的输出额最大。1894年2月1日，轮船招商局的普济号从上海输入了大米共120苞（每苞合六斗二，三升），深受欢迎。⁽⁵⁷⁾ 此后仁川的华商商号像广东商号同顺泰，山东商号永顺福，恒顺昌，双盛泰，锦生，瑞盛泰和永来盛等都大量从上海等地输入大米。⁽⁵⁸⁾ 从2月至4月20日，从上海运至仁川的大米共计170,644担，价值445,161.4元。⁽⁵⁹⁾ 1898年，由于朝鲜的米价渐涨，杂谷类的价格也随之上扬，华商抓住了这一商机，从山东省输入米和杂谷，总价值高达125,900余元。这次输出米和杂谷使用的是蓬船，故一时间中国式的蓬船涌集在仁川码头，场面极为壮观，这是仁川开港之后从未有过的景象。⁽⁶⁰⁾ 自1891年至1896年华商向朝鲜输出大米，面粉等具体情况如下表：⁽⁶¹⁾

除了这些大的商号之外，也有用五六万两资本成立的商行，还有一些更小的店铺，资本只有三四百两。⁽⁶²⁾

年度	种类		面粉（美国产）	
	数量(担)	价格(元)	数量(担)	价格(元)
1891年	3,558	7,581	241	1,024
1892年	6	13	382	1,628
1893年	3	6	21	3,085
1894年	243,195	631,863	789	4,008
1895年	22	50	956	4,992
1896年11月	1,309	3,847	2,959	14,562

(52) 《明治二十六年中仁川港商况年报》，《通商汇纂·韩国篇》1，第497页。
 (53) 《仁川港ニ於ケル支那米ノ輸入境况》，《通商汇纂·韩国篇》2，第405页。
 (54) 《二十七年一月中仁川商况》，《通商汇纂·韩国篇》1，第246页。
 (55) 《朝鲜国平壤杂事》，《通商汇纂·韩国篇》5，第17页。
 (56) 《明治三十年中仁川港商况年报》，《通商汇纂·韩国篇》6，第395页。

(57) 《清国米仁川港へ輸入ノ境况》，《通商汇纂·韩国篇》1，第255页。
 (58) 《仁川港ニ於ケル支那米ノ輸入境况》，《通商汇纂·韩国篇》2，第399页。
 (59) 同上，第405页。
 (60) 《本年（明治三十一年）四月中仁川港商况》，《通商汇纂·韩国篇》6，第228页。
 (61) 《仁川港ニ於ケル米及麦粉ノ状况》，《通商汇纂·韩国篇》4，第61至564页。

这些资本较小的商行和店铺虽然也经营对朝鲜的输出贸易，由于受资本所限，在整个对朝鲜的输出贸易中，所占份额极少。他们更多是做零售生意。

华商除了经营中朝贸易之外，还把经营的范围拓展到了日朝贸易。明治维新之后，开始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日本的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日本商人也开始把本国产品输往朝鲜，并且逐渐打开了销路。在这种情况下，华商也开始从日本的神户、大阪直接采购这些产品，运到朝鲜销售。1894年输往朝鲜的日本产火柴为100,419罗，其中经华商输入的占了50,000罗，几乎占了总输出额的一半。⁽⁶³⁾1897年11月华商直接从日本输往朝鲜的纺织品和杂货就达30,000日元。⁽⁶⁴⁾但是总的说来，华商在经营日朝贸易中，经营的商品种类很少，贸易额在整个日朝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极小。

除了经营中朝贸易和日朝贸易之外，一些华商也把在内地收上来的米谷、豆等运到仁川销售。⁽⁶⁵⁾也有一些华商来到仁川，在这里制造廉价的砖瓦等建筑材料销售。⁽⁶⁶⁾

结语

近代中朝之间的海上贸易是从1882年《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签订之后开始，这种海上贸易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两国民间交往的一种新型关系，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强大的生命力，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关系在开始之后便迅速发展起来。而在近代中朝海上贸易中，又以仁川港的地位最为重要，可以说仁川港是近代中朝贸易的中转港，中国输往朝鲜的货物有很多是经仁川再输往各地的。但是近代仁川港的中朝海上贸易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发展，即中国对朝鲜的输出远远超过了朝鲜对中国的输出，这是由近代中朝两国的国情决定的。在仁川港的中朝海上贸易中，华商占据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仁川

港的中朝海上贸易几乎全部是通过他们实现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经营的范围扩展到了日朝贸易和朝鲜的国内商业。

曾有学者在论及华商在朝鲜的发展时，过分强调清政府与朝鲜保持的宗藩关系的作用，这对朝鲜华商是极其不公平的。在1894年之前，清政府加强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确曾把拓展中朝之间的商务作为加强宗藩关系的一种手段，也因此为华商的经营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条件，但是这在朝鲜华商的发展中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势力被迫从朝鲜撤出，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朝鲜华商的发展，也没有影响中朝海上贸易的发展。在战争结束后，华商又迅速发展起来，并基本上掌握了仁川港输入贸易的主导权。由此也可以看出，清政府加强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对华商在朝鲜的发展并非决定因素。

(62) 《明治二十六年中仁川港商况年报》，《通商汇纂·韩国篇》1，第625页。

(63) 《二十七年中仁川港商况年报》，《通商汇纂·韩国篇》2，第277页。

(64) 《三十年十一月仁川港商况》，《通商汇纂·韩国篇》5，第493页。

(65) 《旧韩国外交文书》第九卷（清案2），第26至27页。

(66) 《明治二十六年中仁川港商况年报》，《通商汇纂·韩国篇》1，第644页。